

印尼智库乌玛尔·朱沃诺 新兴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仍然不足

来自印度尼西亚信息与发展研究中心（CIDES）主席乌玛尔·朱沃诺聚焦了全球金融治理与新兴经济体这一重大课题。

在朱沃诺看来,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规模相对较小,集中化程度较高,发展程度不深,特别是缺乏金融衍生品市场。而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采用巴塞尔规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金融稳定性,不过针对资本要求较高的“巴塞尔协议 III 资本框架”可能加剧去杠杆化,不仅增加全球性银行在新兴经济体的运营成本,同时还增加了本土银行的运营成本,因此造成信贷减少和金融流动性降低。

他进一步指出,新兴经济体国内货币市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巴西、韩国和墨西哥等少数几个国家形成了发展程度相当成熟和具有流动性的短期市场,而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本国货币市场并未达到同一水准。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限制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管理在经济困难时期可帮助国内经济免受影响,但这些措施会阻碍区域合作和投资流动。

面对新兴经济体所遭遇的难题,朱沃诺提出了两方面的解决路径。一是积极培育新兴经济体国内的资本市场,并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政策改革。他特别举了中国的例子。中国加入 WTO 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类似地,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将极大地促进本地区金融市场的深化,显著增加地区间资本流动。同时,培育国内金融市场和改进监管还有利于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不再陷于繁荣与萧条的无限循环中,而是能够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轨迹。

二是,G20 成员国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加强政策协调,增强他们在 G20 和金融稳定委员会论坛共同的声音,促使发达经济体应考虑自身的金融改革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同样地,放松和收紧货币政策也应考虑到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这样资本流入流出不会波动太大,否则,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很难加以缓解。

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刘志勤 G20 国家经济状况



在回顾过去一年 G20 各国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两方面的表现时,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认为,“中美两国都能得 90 分”。

针对上次 G20 峰会主要议题“增长和就业”,刘志勤对参会国过去一年的表现给予了判分:中国 90 分;美国 90 分;欧 85 分;印度 75 分;俄罗斯 75 分;其它国家 80 分。该评分满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格,目的是表明各国之间相应的经济政策和市场,以及和其它国家的利益平衡效果关系。

刘志勤认为,中国过去一年的经济表现可圈可点。从政策层面,中国公布并执行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符合市场规律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在调结构,抓转型,促改革,稳增长,保民生等方面的政策获得巨大成功。到 2014 年 6 月底,中国的 GDP 保持在 7.5%,基本完成预定发展目标。这个指标实现的最大价值在于,其经济增长所附带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大低于过去 10 年。所以,中国在 2014 年出色完成了自己承诺的“增长”指标,并且为世界各国经济复苏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志勤强调,中国的“就业”形势具有特殊压力。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个长期的历史现实。至 2014 年 6 月底,中国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结果是 50.5%,是近几年最好的状况。所以综合中国在“增长和就业”两个方面的表现,中国的分数为 90 分。

在谈及 G20 其他几个主要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两方面的表现时,刘志勤做出如下分析:美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曲折,GDP 增长 4%取得近期较好的成绩,但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外来移民者增加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和复杂程度;欧盟的经济现状始终令人“放心不下”,失业率居高不下,解决就业对于印度政府而言任重道远;印度近期可能爆发货币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在增加;而俄罗斯因乌克兰冲突面临欧美制裁,其经济状况比其它国家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在 G20 中角色的展望,刘志勤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说,“中国在过去的 35 年中,在世界经济发展大舞台上,始终起着‘后厨’的作用;中国为世界各国做出了各种美味佳肴。当西方发达国家再次在富丽堂皇的前厅里品尝中国在‘后厨’准备出的各类美食时,不忘抨击‘后厨’里冒出的油烟雾霾,而中国始终担当着任劳任怨的世界‘厨师’和‘服务生’的角色。如今,这一切因为 G20 应该彻底改变了。一切均值得期待。”

俄著名学者谢尔盖·阿凡特谢夫 G7 对全球没有吸引力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理论部主任、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GIMO 大学）教授谢尔盖·阿凡特谢夫在发言时指出,G20 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带头人,G7 的决定对于全球而言,已不具吸引力。

他说,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G7/G8 曾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中发挥着突出作用,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下降,G7 主要负责协

调发达国家应对影响其本国经济的挑战——回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 G7 成立之初的使命。随着 2014 年 3 月白宫宣布暂停俄罗斯 G8 成员国地位,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G7 的决定对于全球而言,更不具吸引力。

他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带来的最好消息是,治理机制在应对“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的过程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后者曾长期困扰着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国际机构。随着新兴经济体、企业和民间团体越

重阳金融研究院罗思义 全球应学习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指出,中国特色和普遍 / 全球要素并不矛盾。要素与中国特定的结合创造了中国特色,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驱动力具有普遍 / 全球特色。因此,其他国家应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

罗思义首先介绍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他说,自 1978 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生活水平增速也高于任何主要经济

体。而且,中国不仅在长期增长率方面高于其他经济体,在短期应对危机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就完成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

罗思义说,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但不应机械照搬中国的政策。各国应根据普遍 / 全球因素分析中国经济政策的构成,再

来越多地参与治理议程的制定,需要通过谈判确定的、旨在改善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的新规则和规范都可能需要得到更广泛的国际认可。

然而,阿凡特谢夫同时指出,传统的“合法性—可操作性”(legitimacy-operativeness)困境依然存在。因此可以借助两种策略应对“可操作性赤字”(operativeness deficit)问题。一方面,包容性治理机制应针对那些关键参与者的利益,如果没有重合,要求借助不存在冲突的、具体国家(和具体地区)的措施来应对共同挑战的问题。这是一种可为 2014 年 11 月 G20 布里斯班峰会成功起草并执行决议做好准备的策略。另一方面,在全球主要参与者存在严重利益不对称的地区,应采用国家集团的方式予以解决。尽管这种方法经常因为不关心未被邀请参与(或不具资格)相关治理行动计划的国家的利益而饱受批评,但在“真正的全球性”决定因长期的利益不对称而受阻时,这不失为上佳选择。金砖国家近期的金融举措就是这种方法能够对参与国产生潜在积极影响、而不会对其他第三方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典型示例。

欧洲学者安东尼奥·维拉弗朗卡 要避免全球经济瘫痪

在谈及 G20 的发展前景时,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副主任、欧洲项目主任安东尼奥·维拉弗朗卡认为,G20 国家领导人目前的主要担忧是如何避免国际组织陷入瘫痪的命运,同时,避免“意大利面碗”效应,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将会对各方造成不利影响。

维拉弗朗卡指出,G20 国家领导人应就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重要事项达成政治协议,例如降低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程度;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和支持就业改善国内宏观经济稳定性;通过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提高金融稳定性;通过实现不同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更加公平的作用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在仍未充分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待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优先事项确定之后,他们应附上时间表。

维拉弗朗卡介绍说,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特别是美国和一些经常账户盈余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不再接受被视为危机根源的发达经济体在主导全球宏观经济治理的国际机构中(首当其冲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拥有太大的权力和太多的代表权。2008 年末,讨论全球经济事务的主要论坛已经从七国集团(G7)转为二十国集团(G20)。但是结果证明,这一推动力并没有维持多久。全球治理改革在 2010 年后开始停滞不前,而当时美国经济开始恢复,这似乎并非巧合。G20 于 2008 年后,将焦点聚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投票权改革。尽管首轮改革已于 2011 年生效,而 2010 年一致达成的改革事宜仍在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张燕玲 不能再由西方定规矩

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在发言时指出,G20 领导人是全世界的精英,应展现远见和魄力,用正确的思想和理念引导全球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不能再由西方定规矩,全球去执行。

她说,世界金融改革和全球治理模式需要更新的呼声由来已久,纵观百余年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发展、变迁的脉络,基本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危机倒逼改革;二是霸权主导金融体系;三是霸权的衰落导致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她认为,G20 这一应对危机的产物,已显示了其治理危机的成效,各次峰会证明了平等对话的力量。全球合作协同应对危机取得的成果,说明了 G20 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联合治理的优势,各国元首亲自参与对话是 G20 效率和权威的根本保证。世界对 G20 充满期待,盼望在相当长的时期,G20 能成为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治理的最高级论坛,并自觉的进行与时俱进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发达国家应顺势而为,放弃霸权思维。张燕玲同时建议,G20 也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包括:议行合一的权威性、影响广泛的代表性、利益共享的普惠性、防患未然的前瞻性以及双脑并用的创意性。总之,在制度设计方面,应加强机制化和制度化,而不应让 G20 复杂化。

美智库莫莉·埃尔金－科萨特 15 年是多边主义的关键年

美国进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莫莉·埃尔金－科萨特指出,2015 年将是决定多边主义未来的关键一年。届时将召开四次政治级别最高的国际会议:一次发展筹资会议、一次协商未来发展议程的首脑峰会、一次商讨未来气候条约的谈判,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从本质上来看,这四次会议相互关联并与 G20 的核心经济议程密切相关。

埃尔金－科萨特介绍说,G20 从现在到 2015 年 7 月发展筹资会议开幕的这段时间内,应通过专注当前的重点问题,制定一套长期实施计划,有效补充最终的发展筹资协议并帮助确保协议达成。特别是,G20 能够加快鼓励成员国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金等。G20 应在如下关键发展重点上采取行动:鼓励私营部门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国际税收制度确保发展中国家受益,包括打击针对税收的相关犯罪行为,同时增进各国政府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助发展中国家推广正规金融服务,并降低转账汇款至发展中国家的成本。

埃尔金－科萨特认为,2015 年后 G20 议程存在的一个严重风险是,成员国可能会在气候或贸易问题谈判中发生冲突。确保这些共同体彼此对话并达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协议至关重要。鉴于 G20 会议的级别高,以及经济和金融问题与这些问题相互交织,G20 能够在促进这些对话中发挥作用,确保所有政府携手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同时也允许国家之间进行对话,找出存在共识或分歧的领域,规划达成一致的合理途径。G20 可以在政治和实际行动上发挥关键作用,确保就资助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及其他重要的多边进程达成共识。

问题,卡洛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G20 要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尽管在这一领域 G20 完成了大量工作,但还是应当重点关注扩展区域金融协议(包括双边互换)及应急储备安排协议的范围以及相互评估进程的运作。此外,基础设施融资也是促进增长的重要议题,值得 G20 投入更多关注。其次,鉴于近些年多边贸易方面取得的进展较少,卡洛斯建议 G20 应当促进出台极为具体的机制,甚至是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管理、检测和审查全球层面的区域贸易协定,突出协议内容,确保其与多边贸易治理保持一致。另外,促进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是时下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动力,尤其是对于全球中小企业。这需要 G20 的持续跟踪。第三,G20 对于相关气候政策的承诺好坏参半,决不能忽视主要成员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谈判上的实质性差异。G20 可以就气候融资的具体机制进行研究,采取具有可行性的气候承诺技术开发和实施。最后,卡洛斯呼吁通过推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实现长期和平与发展,提出在消除贫困方面有待国际社会实现的具体目标。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名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卡洛斯·马格里诺斯认为全球经济的现状是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结果。G20 实现从危机预防到长期战略规划转变的最好办法就是专注于至少已经成功的方面,即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卡洛斯指出为了调整这种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G20 可能今后会专注于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处理若

干问题。正如在 2008 年 11 月针对金融危机最紧迫问题时所应对的那样,G20 可能会将全球公共产品视为在贸易、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融资以帮助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出口和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全球政策成果。

卡洛斯还提到,从本质上讲,公共产品有供应问题决定,不能轻易由私人市场提供,另一方面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人应当更加多样化。为此,针对他提出的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这一